

## 日本所藏敦煌文獻的來源及真偽\*

——讀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劄記

劉進寶

日本是除巴黎、倫敦、聖彼得堡和北京四大敦煌文獻收藏中心外，藏有敦煌文獻數量最多的國家。日本所藏的敦煌吐魯番遺書，除由大谷光瑞探險隊帶回日本的外，其他藏品由於其來源比較神秘，基本上都是由日本書商做中介，從中國的書商那裏收購而來的。學術界也曾有過真偽的質疑，如京都大學的藤枝晃教授曾說過，日本所藏敦煌遺書，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假的。對藤枝晃教授的這一說法，日本國內也有反對的意見<sup>1</sup>。要瞭解日本所藏敦煌文獻的來源及其真偽，就需要讀高田時雄教授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sup>2</sup>。

高田時雄教授是國際著名的敦煌學家，特別具有語言學的天賦，在敦煌的民族、語言方面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近年來，致力於敦煌學學術史的研究，尤側重日本學者搜尋敦煌文獻的艱難歷程、日本所藏敦煌文獻的來源、數量和真偽考辯等方面，陸續發表了《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探求敦煌寫本——日本學者的歐洲訪書行》《內藤湖南的敦煌學》《清野謙次搜集敦煌寫經的下落》《羽田亨與敦煌寫本》《日藏敦煌遺書的來源與真偽問題》《李滂與白堅》《俄國中亞考察團所獲藏品與日本學者》等學術史論文，對日藏敦煌文獻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認真探索，揭示了許多新的資料，解決了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課題。現在，高田先生將其有關敦煌學學術史和有關漢學文獻的訪書、傳承等論文結集為《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雖然其中有關敦煌學學術史的絕大部分論文在發表時我都讀過，但結集後重新再讀，仍然感覺新見迭出，值得推薦與介紹。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學學術史資料整理與研究”（17ZDA213）的階段性成果。

<sup>1</sup>鄭詩亮《高田時雄談敦煌遺書和漢學文獻的訪求》，《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9年7月29日。

<sup>2</sup>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日本的敦煌學研究起步較早，可以說幾乎與中國同步。當 1909 年伯希和在北京與中國學者羅振玉等接觸後，引發了中日敦煌學的熱潮，也被譽為敦煌學的起始<sup>3</sup>，因此伯希和的這次北京之行備受學術界關注。當時常駐北京的日本漢籍書店“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是最早公開報導伯希和 1909 年北京之行的人。關於北京學術界公宴伯希和的具體日期，田中慶太郎明確說是在“9 月 4 日”，但 2004 年 4 月出版的《惲毓鼎澄齋日記》將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記錄在 1909 年 10 月 4 日。至於伯希和離開北京的時間，田中慶太郎說是“9 月 11 日傍晚”，根據《江瀚日記》，應該是在“10 月 11 日晚”乘車離開北京<sup>4</sup>。

正是這次的公宴事件，才促成了學部、京師大學堂的主事官員同意購買劫餘敦煌寫卷。1910 年劫餘敦煌遺書運到北京後，日本學者即着手組隊前往北京調查敦煌文獻，這就有了影響深遠的五教授赴北京訪書事件，即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內藤湖南三位教授和富岡謙藏、濱田耕作兩位講師到北京調查敦煌遺書。他們於 8 月下旬出發，9 月初到達北京，在北京工作一個月後，於 10 月中下旬回國<sup>5</sup>。

據神田喜一郎記載，在京都五教授赴北京訪書時，“還有一位瀧精一博士是受國華社派遣到達北京的，基本上與京都五位先生一起工作。瀧博士主要調查端方的收藏品”。“在端方家觀賞收藏品時，博士對一幅敦煌的唐朝觀音像非常關注，這引發了他對敦煌畫的極大興趣。後來瀧博士的弟子松本榮一博士繼承了敦煌畫領域的研究。”<sup>6</sup>高田先生對此也有記述：“掌管《國華》的美術史家瀧精一也作為國華社的派遣隊員，與上述五名派遣教官同行。瀧氏在端方收藏品的調查工作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71 頁。以下凡引用本書，只注明頁碼）

1910 年日本派遣 5 位教官赴北京調查敦煌文獻的活動，“不僅使敦煌學的開拓事業前進了一大步，派遣活動的間接結果，還對其後敦煌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71 頁）可以說這次的派遣活動開創了日本學者早期赴各國“搜寶式”調查敦煌文獻的先河。

日本派五位學者到中國訪書，回國後還舉行了盛況空前的展覽，神田喜一郎認為：“但實際上就敦煌古書方面來說，似乎與期待并不相符，報告書中也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究其原因是因為敦煌古書中最珍貴的部分已經被斯坦因與伯希和帶走，剩餘部分幾乎僅僅是佛教經典。運回北京學部的敦煌古書數量大約是五六千卷，大部分是佛典。另外後來才知道，從敦煌運到北京途中，特別珍貴的文物幾乎都被盜走一

<sup>3</sup>詳見劉進寶主編《百年敦煌學：歷史·現狀·趨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 年。

<sup>4</sup>王冀青《伯希和 1909 年北京之行相關事件雜考》，《敦煌學輯刊》2017 年第 4 期；秦樺林《1909 年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補考——兼論王國維與早期敦煌學》，《浙江大學學報》2018 年第 3 期。

<sup>5</sup>五學者回國日期不同，是因為分別活動，并非全部是集體的統一行動。詳見高田時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

<sup>6</sup>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高野雪、初曉波、高野哲次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18 頁。

空……因此最後運到北京學部的古書就不是那麼珍貴了。京都大學的各位先生們興致勃勃地出發到北京考察敦煌古書，但看到的結果不免令人有些失望。儘管如此，敦煌熱并未有絲毫減退，反而漸漸升溫。”<sup>7</sup>高田先生也有類似的意見，認為“備受期待的北京訪書的結果却并未達到他們的預期。”（92 頁）對於內藤湖南來說，如果說他 1910 年北京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敦煌遺書的話，便沒有得到令人期待的成果，其原因是遺書的內容幾乎全是佛典。”（109 頁）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似乎不是特別準確。因為內藤等於 1910 年赴北京調查敦煌遺書時，雖然得到了羅振玉等人的幫助，但當時敦煌遺書還沒有整理與編目，許多具體內容還不清楚，閱讀也不方便，他們只是翻閱了近 800 卷，也只是將其中的 700 卷作了目錄，這些閱讀和作了目錄的敦煌遺書恰好主要是佛教典籍。這在當時以“搜寶式”方式收集敦煌文獻的時代，肯定不會像世俗文書或道教、景教、摩尼教文書那樣，只要拿到一件敦煌文書就能做大文章，將其價值發揮到極致。

## 二

倫敦、巴黎、聖彼得堡和北京是敦煌文獻的四大收藏中心，除此之外的最大收藏地就是日本了。日本所藏敦煌文獻，以羽田亨舊藏最為大宗，由於這些藏品的主體來自李盛鐸舊藏（編號 1-432），真實可靠，長期受到敦煌學者的關注。1919 年 9 月 20 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說：“李氏諸書，誠為千載秘笈，聞之神往。”<sup>8</sup>李盛鐸去世後，其後人將藏品賣給日本人，但後來究竟藏於何處，學界并不十分清楚，由於這批敦煌文獻數量龐大，研究價值較高，並且公佈較晚，曾一度被有些學者稱為敦煌文獻“最後的寶藏”。<sup>9</sup>

李盛鐸所藏敦煌寫本由於來源可靠，是散藏敦煌文獻中最值得關注的部分。而關於其流入日本的具體情況則不太清楚，高田時雄教授緊緊抓住其中的最關鍵人物——寫本的管理者（或實際上的擁有者）李滂和出售的具體經辦人白堅，連續撰寫發表了幾篇文章，現在將其合并為《李滂與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流入日本之背景》，分為正編、補遺、再補和三補，收入本書首篇。

1936 年，李盛鐸所藏敦煌寫本 432 件轉入京都大學教授羽田亨之手。1938 年 11 月，羽田亨任京都大學校長後，將這批經卷保存在校長室。二戰末期的 1945 年，為躲避戰火將其疏散藏在兵庫縣的山中，其中既有李盛鐸舊藏，還有其他的寫本，總

<sup>7</sup>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第 19 頁。

<sup>8</sup>王國維《觀堂書劄》，《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 1 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7 頁。

<sup>9</sup>榮新江《追尋最後的寶藏——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劉進寶、高田時雄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5-32 頁。

計 736 件。

李盛鐸晚年，專事其木犀軒藏書管理的是其第十子李滂（字少微），當然也包括其收藏的敦煌寫本。而李滂的身世却非常奇特，李盛鐸曾在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擔任駐日公使。光緒三十一年（1905）李盛鐸被任命為駐比利時欽差大臣，并兼命加入出洋考察憲政大臣之列，出使日、英、法、德、比諸國。這時候一位名叫橫溝菊子的日本女人進入了李盛鐸的視線。橫溝菊子是原日本勞動組合運動創始者高野房太郎的夫人，“高野因在日本的活動呈僵局之勢，故爾 1900 年往中國青島經商，但不幸於 1904 年 3 月 12 日客死他鄉。菊子帶着兩個孩子回到日本，寄身親戚家，勉強維生。因菊子略曉漢語，便到中國公使館工作”（第 4 頁）。當李盛鐸赴比利時任職時，菊子也一同前往，并在比利時生下了李滂。李盛鐸於宣統元年（1909）任職結束回天津時，菊子聞知東京的親人病危，便告別幼子李滂，獨自返回東京。後李滂委托白堅赴日本出售敦煌寫本時，也曾順便尋找其生母，但菊子早在大正三年（1914）1 月 22 日已經病逝，年僅 34 歲。

關於李盛鐸擬出售敦煌寫本的原因，高田先生指出：李盛鐸晚年“由於訴訟而生的債務等個人原因，需要大筆金錢而欲出手所藏敦煌寫本”，（84 頁）“李盛鐸晚年訴訟纏身，經濟困難，陷入不得不考慮處理藏書的窘境。實際擔當此任的是李滂”。（7 頁）因此李滂於 1935 年初從天津到上海，請白堅以尋找生母為借口赴日本物色敦煌寫本的買主。這也可能是李滂“對生母的祖國日本懷有十分親近之情”（8 頁）的緣故吧！而“李滂對母親的祖國，在感情上懷有很強的親近感，將李家的敦煌寫本售於日本，應無心理上的抵觸。”（22-23 頁）1935 年 12 月 15 及 21 日的《中央時事週報》上刊發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日本學者羽田亨此前曾看過李藏敦煌文獻，又知道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所以給予了高度關注。白堅到了日本後，即“商定將李家所藏敦煌寫本賣與羽田。之後，李盛鐸舊藏寫本共 432 件，從次年 2 月起分批運到京都羽田處。提供資金的是大阪經營製藥公司的武田長兵衛。羽田此後又通過市場或者收藏家的割愛不斷購入敦煌遺書，增加其收藏。”（140 頁）羽田收集的敦煌寫本就是杏雨書屋所藏之物，由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管理。

至於白堅，早年畢業於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在政府部門任職，并從事以書畫為主的美術品經營，後以轉賣獲利為主，而“轉賣的對象大部分在日本。”（12 頁）如王樹枏在任新疆布政使的 10 年間，曾入手許多吐魯番寫本，有相當部分（古寫經 28 卷 8 帖）已於 1922 年經文求堂主田中慶太郎之手以二萬日元賣給中村不折。此後，白堅又從王樹枏處獲得晉寫本陳壽《三國志·吳志》殘卷，并於 1930 年轉讓給武居綾藏。另外，經白堅之手賣給中村不折的還有 [01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四，梁天監十一年（512）寫本；[025]《佛說金剛波羅蜜經》，梁大同元年（535）寫本。（12—13 頁）

另外，1925年，內藤湖南還通過白堅之手，得到了唐寫本《說文解字》殘卷，藏在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的“杏雨書屋”。（17頁）眾所周知，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發現以前，唐人寫本是非常罕見的。清代學者莫友芝得到唐《說文解字》木部殘頁後，視為珍寶，曾國藩寫序時曾說：“插架森森多於筍，世上何曾見唐本”。

羽田亨從1936年秋至1942年12月期間，盡全力收集敦煌文獻，從而“形成日本國內最為豐富的敦煌寫本收藏。”即除了李盛鐸舊藏的432件外，還有來自高楠順次郎、富岡謙藏、清野謙次及其他私家舊藏。由於羽田亨收集敦煌文獻的資金來自大阪制藥商武田長兵衛的資助，因此，這批敦煌文獻的所有權歸屬於出資的武田家族，並入藏武田的個人文庫“杏雨書屋”，1977年，武田長兵衛將原“杏雨書屋”藏書全部捐贈給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管理。2009-2013年，日本大阪財團法人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以《敦煌秘笈》為名刊佈了這批文書。共758號（實際共編775號，缺486-500、714、724等17個號），分“影片冊”9冊和“目錄冊”1冊。

### 三

在閱讀英藏和法藏敦煌文書方面，日本學者與中國學者遇到了同樣的情況，即閱讀法藏寫本比英藏寫本容易多了，如20世紀30年代赴英法訪書的向達和王重民先生就有親身感受。向達先生受北平圖書館的派遣，1935年12月至1936年7月，任牛津大學圖書館臨時館員，已決定隨後赴英國圖書館工作，所以就想辦法聯繫閱讀敦煌文獻，但結果并不理想：

至於在倫敦之工作，現在全無把握。弟到英後，幾乎無往而不碰壁。……弟來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之敦煌卷子，管理人為Dr.Lionel Giles，前後見到兩次，俱甚冷淡，且對人表示拒絕。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對於敦煌卷子作一通盤研究相詢，彼亦表示拒絕。此種情形，大有陷弟於進退兩難之勢。然既已至此，不能不極力想法，庶不致如入寶山，空手而反。現在擬托其他英國人代為轉圜，將來研究一層，或可有萬一之望也<sup>10</sup>。

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向達在英國圖書館工作一年，期間“閱讀敦煌卷子。因為小翟理斯博士（Dr.Lionel Giles）的留難，一年之間，看到的漢文和回鶻文卷子，一共才五百卷左右。”<sup>11</sup>“倫敦的敦煌卷子，一向不大公開，以前人看到的，都不

<sup>10</sup>《向達致舒新城、武佛航信》（1936年2月16日），見徐俊《書割中的雪泥鴻跡——中華書局所藏向達致舒新城書割釋讀》，樊錦詩、榮新江、林世田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4-15頁。

<sup>11</sup>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原載《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此據《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95頁。

過是一鱗半爪。”<sup>12</sup>王重民先生於 1934 年秋到巴黎後，能夠“遍閱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搜幽剔佚，所獲實多。”但到英國倫敦後，翟理斯也只是讓他“選閱數卷”，以盡其興。王先生就從目錄卡片中選取了三件閱讀<sup>13</sup>。

爲什麼向達和王重民先生查閱英國所藏敦煌文獻這樣困難？其原因一直不是很清楚。通過高田的論述，我們知道了大體原因，即不是英國博物館本身的原因，責任也不在斯坦因。斯坦因還是比較開放的，“斯坦因本人不通漢語，不過他採取了合理的方式，即將自己不能解決的語言材料委托給可以勝任的學者進行整理和研究”，並於 1910 年委托伯希和整理，（95 頁）但不知什麼原因最後未能進行。當日本學者矢吹慶輝於 1916 年 6 月到 11 月赴英國調查敦煌寫本時還比較順利：

我自己第一次調查，是在大英博物館的一間地下室中——正是由於德國空中襲倫的騷動，連有名的羅塞塔（達）石碑也被封閉在地下室的時候——在斯坦因氏的收藏室裏，斯坦因和他的助手洛裏默（Lorimer）小姐匆忙地整理着原稿，處理其他事務。我最初是一包一包地借出來閱讀，後來得到特殊優待，借到了書庫、書架的鑰匙，自由地拿出自己喜歡的寫本來閱讀……我就這樣調查了斯氏所藏的數千件古寫本，主要是搜集古逸未傳的佛教典籍，同時涉獵了古寫經和古文書。並爲自己認爲珍貴的寫本拍攝了無底片黑白照片，從 6 月一直到 11 月上旬，我一直在愉快地調查和鑒定寫本<sup>14</sup>。

但從 1919 年開始由翟理斯掌管斯坦因所獲敦煌文書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同樣是矢吹慶輝，他於 1920 年向英國博物館提出申請，計劃將他第一次調查時未能拍攝的三千餘葉全部拍攝時，結果只允許拍攝五十餘葉。矢吹解釋了原因：

該館的東方部不能簡單地通過我方申請的主要理由是：首先，這些收藏品屬於大英博物館，斯坦因去了克什米爾，寫本已不再由斯坦因保管，而斯坦因管理時的編號也全部被更換了。寫本的管理者換成了翟理斯（Dr. Lionel Giles），翟理斯自己正在努力整理這些寫本，目前禁止公開寫本。因此當初我記在四冊寫本記中的號碼已經失效，即便知道寫本內容也很難檢索。另外，翟理斯還禁止隨便拍攝照片。而大部分寫本都是殘

<sup>12</sup>向達《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原載 1937 年《新中華雜誌》第 5 卷第 13 號。此據《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 240 頁。

<sup>13</sup>王重民《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原載 1936 年 4 月 2 日《大公報·圖書副刊》。此據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1-2 頁。

<sup>14</sup>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說》後記，東京：岩波書店，1933 年，第 14 頁。轉引自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第 97 頁。無底片黑白照片是當時流行的照片，不用底片，用特殊的感光紙直接洗印，但無法加印太多照片。

卷，有的原本就沒有題目，有的因殘損而失題，還有不少寫本尚未修繕，很容易破損<sup>15</sup>。

雖然如此，但矢吹還是不死心，便於大正十一年（1922）10月再次前往英國。“博物館方以規定作為擋箭牌，拒絕矢吹拍攝照片。”（98頁）矢吹就用利誘加威脅的辦法與翟理斯協商：“自己所掌握的佛教專業知識，對整理工作裨益良多，並表明願意無償協助整理。否則，將來目錄完成的時候，他可能會提出很多的批評，如果現在能合作，就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正是這樣的利誘加威脅，翟理斯便接受了他的協助。這樣，矢吹的目的也達到了，他“拍攝了六千多張無底片黑白照片”，成果的一部分就是《鳴沙餘韻》，同時還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三階教的研究》。（99頁）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羽田亨身上。從大正八年（1919）7月26日開始，羽田赴美、英、法、丹麥出差，其間也調查敦煌寫本。由於他與伯希和此前就有書信往來，伯希和不僅對他提供了許多便利，而且還允許他將保存在伯希和手頭的寫本帶回自己的住處進行研究。羽田將此拍攝成照片帶回日本，後來他們兩人合作出版了《敦煌遺書》。另外，羽田還抄錄了伯希和的目錄，帶回日本後複製送同輩學人，這就是羅福萇翻譯的《巴黎圖書館所藏敦煌書目》，發表在《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3年）和第三卷第四期（1932年）。而在英國却是異常的艱難，據羽田亨後來回憶：

不想讓他人看到自己正在整理或調查中、又還尚未深入研究的資料，此乃人之常情。因而這兩人（翟理斯和東方部主任巴尼特）也沒有理由歡迎那些前來提出閱讀申請的人，拿出來供人閱覽的也大多是普通的佛教典籍，或是在特別要求的種類中不重要的幾種寫本。如果要申請閱覽稍有價值的寫本，他們便不會給人好臉色，亦或是找借口拒絕，這些都是常事。想要在這裏閱覽甚至抄錄自己預期的重要資料，則需要相當的外交技巧、耐心與熱情<sup>16</sup>。

1924到1925年，內藤湖南率長子內藤乾吉、弟子石濱純太郎、女婿鴛淵一赴歐洲調查敦煌寫本時，遇到的情況還是如此。他們在大英博物館想申請閱讀非佛教文書（因為此前矢吹主要看佛教文書），“我用了僅僅兩周，翻閱完了大約一百三四十卷文書的時候，翟理斯就說已經沒有佛教典籍以外的文書了”。此外，“我從中選出了三十餘種古書，提出了拍攝申請，但因為館內的原因，得到批准的不足半數。”<sup>17</sup>而在法國的情況則大不同，據內藤湖南回憶：“我在巴黎受到了伯希和的款待，用幾乎

<sup>15</sup> 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說》後記，第19頁。轉引自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第98頁。

<sup>16</sup> 羽田亨《中亞史研究資料の探訪》，原載《學燈》第40期第9號，1936年9月6日。轉引自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第101頁。

<sup>17</sup> 內藤湖南《歐洲にて見たる東洋學資料》，載《目睹書譚》，京都：弘文館，1948年。轉引自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第102頁。

六周時間，閱覽了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三百二十餘件。此外，還經過伯希和的特許，閱覽了放置在伯希和的私宅中，尚在整理的敦煌古書三百三四十件，在法國總計閱覽了六百七十件文書”。“我選其中近百件拍攝了照片，與英國不同，在此處提出的拍攝申請幾乎都通過了。”<sup>18</sup> 對於閱讀英藏敦煌文獻常常受阻的原因，高田先生認為，主要是負責編目的翟理斯工作進展緩慢，而且還相當封閉，這可能正是阻礙英藏敦煌文獻全面公開的主因。“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斯坦因的寫本整理進度緩慢，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敦煌學的發展。”（105 頁）

#### 四

高田先生的論著，既有細致的考辯，又有宏觀的論述。其評判雖然是個人的“學術史”，但能夠超越個體，達到一個比較高的境界，從而使其能夠比較冷靜、客觀、公允地評判日本的敦煌學學術史。如通過日本學者在歐洲搜尋敦煌寫本的歷程，可以知道“戰前帝國大學的教官公費留學、出差的機會很多，前往歐洲調查敦煌寫本并非難事。在不算是資料大國的日本，正是因為有着這樣值得銘記的事蹟作為背景，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水准才能位居前沿。”（104—105 頁）

另如在《內藤湖南的敦煌學》中說：“湖南是不做專題著作的學者，一般的理解是，把握歷史的大流行趨勢，指出其內在的性質是湖南治學的特點。為了捕捉大綱，是要用豐富的資料做證明的。湖南之所以耗費大量的精力收集文獻資料也正在於此。”（125 頁）“探訪敦煌遺書，正反映了湖南收集資料活動的一個側面，在這一點上，如果存在湖南的敦煌學的話，作為內藤湖南史料學的一部分當盡力探查。”（126 頁）“在湖南的生涯中，與敦煌遺書最為接近的高峰期有兩次，一次是明治末年的所謂的‘敦煌熱’的輝煌期，第二次是以旅歐為契機再度掀起敦煌熱的時期。”（127-128 頁）

在《羽田亨與敦煌寫本》的最後寫道：“在敦煌學史中，雖然不能給予羽田亨很高的評價，但他在利用敦煌寫本進行西域和回鶻史等學術研究方面的成績，以及在較早時期將英法所藏敦煌寫本帶回日本，收集包括李盛鐸舊藏寫本的敦煌秘笈等方面，應該給予高度評價。”（149 頁）

再如在《日藏敦煌遺書的來源與真偽問題》中寫道：“傳入日本的敦煌遺書，幾乎全部都是經古董商之手購買的，除李盛鐸死後其子李滂直接轉讓的情況，路徑非常可靠之外，其他往往都不可避免混有偽造之品”。“日藏敦煌遺書一方面與并不光彩的竊取行為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另一方面却被用於解開有關自身來路之謎的研究，這種狀況的確具有諷刺意味。”（175 頁）

<sup>18</sup>內藤湖南《歐洲にて見たる東洋學資料》，轉引自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第 102-103 頁。



這種理智的看待問題、分析問題、評判問題的學術態度，是我們從事學術史研究不可或缺的。

一本優秀的論著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或失誤也是正常的，尤其是已發表論文的彙編，由於寫作的時代、原發表刊物的不同，可能會有重複或前後不一致之處。現就閱讀中遇到的一點疑慮提出來，請作者斟酌考慮。

第 58 頁關於 2013 年 12 月 10 日在臺北參加“《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出版志慶”活動時，說李亭佑作了《“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工作報告。這裏的“李亭佑”可能是陳亭佑。陳亭佑在 2018 年底出版的《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20 輯上發表了《史語所敦煌研究考略——以傅斯年檔案所見爲主》，該文對作者的介紹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高田先生認爲，劫餘的敦煌文獻運抵北京後，“受羅振玉之邀，五位京都文科大學的教官組成了調查團前去觀覽”（108 頁）。五教官赴北京調查敦煌文獻，是中日學術史上的重大事件，學術界給予了較多關注，高田先生也有專文《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員北京訪書始末》，似也沒有材料證明是由羅振玉邀請的。只是說“此次調查活動的成行就是源於羅振玉陸續提供的信息”（75 頁），這樣的表述應該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作者為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